



学习鲁迅

到底革命的精神

10.96

学习鲁迅
彻底革命的精神

本社编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第二印制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

1976年8月第1次 197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1,000册
书号：8301·403 元价：0.15元

毛主席语录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主席语录

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

毛主席语录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目 录

- 彻底批判复辟倒退 热情扶持新生事物
——学习鲁迅杂文的一点体会 金 江 (1)
- 清除革命营垒中的“蛀虫”
——学习鲁迅反对投降派的革命斗争经验 冯 华 (8)
- 投一光辉，使群魔嘴脸毕现
——学习鲁迅同谣言家斗争的历史经验 石一歌 (13)
- “永远进击”的共产主义战士
——学习鲁迅的彻底革命精神 柏 青 (20)
- 难忘的告诫
——学习鲁迅的革命坚定性 司徒伟智 (30)
- 历史的巨轮 决不会停运
——学习鲁迅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黄 霖 (38)
- 学习鲁迅对旧教育的批判 史 众 (44)
- 讨伐吃人的儒家教育的檄文
——读鲁迅的《孔乙己》 冯天瑜 (53)

彻底批判复辟倒退 热情扶持新生事物

——学习鲁迅杂文的一点体会

金 江

鲁迅光辉战斗的一生，同形形色色复辟倒退势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韧不拔，用那锋利的战斗的笔，揭露了复辟倒退势力丑恶的嘴脸，总结了对反革命阶级进行斗争的丰富经验。重温这些经验，对于我们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很有益处的。

揭穿复辟倒退派的丑恶嘴脸

“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五四运动发生以后，鲁迅奋力“呐喊”着，同那些封建复古势力进行战斗。鲁迅看穿了他们的本质，深刻地指出，一切复辟倒退势力就象生物学家说的那一类守旧的猴子，它们死抱着一个陈规旧律：

“我们底祖先一向是爬的，不许你站！”谁想打破这套旧习，站起来，那就“咬死”。在这里，鲁迅指出了倒退派的一个重要特征：一是自己守旧，走老路；二是也不准别人前进，不准别人革命。鲁迅曾经刻画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复辟倒退派的艺术形象。

讥笑新事物，宣传开倒车，这是复辟派惯用的伎俩。鲁迅的小说《肥皂》中就有这样一个标本——四铭。此人极度害怕新文化，污蔑新学堂，辱骂五四运动，叫嚷新学堂“应该统统关掉”。他一心想把时代的车轮拉回到那个“专重圣经崇拜孟母”的老路上去。用“僵死的语言，污蔑尽现在”，这正是反革命阶级对革命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

当革命胜利发展的时候，倒退派又有另一种办法：把自己装扮成“革命党”，欺骗人民。《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就是这么一个艺术典型。这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割掉了辫子，挂起一个“革命党”的“银桃子”，自称“革命”了。于是，举起那根哭丧棒，不准贫苦农民阿Q革命。这种“挂新招牌以自利”的“革命党”，在中国历史上真是屡见不鲜，他们是一群“假革命的反革命者”。

“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二九一页）鲁迅笔下这些复辟倒退派，简直象镜子一般，用它照一照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不是很能显露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本相吗？他重新工作以后的种种丑恶表演，那套“今不如昔”的奇谈怪论，那极扼杀新生事物的修正主义大棒，同鲁迅笔下的复辟派的伎俩何等相似，邓小平承袭的正是复辟倒退“祖传的成法”。

鲁迅指出，这些复辟倒退派们总是梦想着一个“十全停滞的生活”。因而，“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他们把“已经和现代社会毫无关系”，“已经唱完，或将要唱完”的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观念捧作“国粹”，大喊“保古”，实质上，就是不准中国人民砸碎旧世界的锁链，要中国人民永远做奴隶。那些复辟倒退派们，在沿着他们的祖先的老例，爬回到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去的时候，就

可以借此保住自己阔气的日月。然而，新生的事物总是要摧毁旧事物的，这对于想凭借旧事物当阔人的“旧的尊者就不利”，因此，他们就要拼命地反对新文化，扼杀新思潮。鲁迅指出：“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历史已经多次证明鲁迅这一断言的正确。只要复辟倒退势力一上台，跟着来的就是对新的革命力量的残酷的阶级报复。这种惨痛的教训在中国革命中曾经一再重复。鲁迅将这些复辟倒退派斥之为：“现在的屠杀者”，并指出“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辛辣地揭示出一切复辟倒退势力反动的本性。

今天，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不也是这样一个要求“十全停滞”的“现在的屠杀者”吗？他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极度仇视，要翻案，要算账；他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用旧习惯和旧道德，或者凭官力”加以禁锢和摧残；他把革命的深入发展污蔑为“极左”。一句话，他妄图把正在前进的“现在”加以全盘“屠杀”，从而复辟资本主义，抹掉共产主义光明的“将来”。但是，“中国一切旧物，无论如何，定必崩溃”，无产阶级将坚持“所信的主义”，大呼猛进，把“旧轨道”彻底清除，这是历史的必然。右倾翻案风道能阻碍得了？

警惕“同路人” “拉车屁股向后”

在同复辟倒退势力的斗争中，鲁迅敏锐地洞察到：一些曾经和革命同道、革过别人命的人，在革命深入发展的时刻，会变成反对革命、开历史倒车的角色。鲁迅举例说，康

有为曾经是“戊戌政变的主角”，却成了“复辟的祖师”；严复从“译过好几部鬼子书”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传播者，走到了为袁世凯称帝“劝进”的“帮闲”；章太炎是提倡革命的先驱，后来竟成为“退居于宁静的学者”，在孙传芳大搞复古的时候“参与投壶，接收馈赠”；刘半农是在文学革命中“很打了几个大仗”的战士，却变成了反对文化革命的复古主义者。这是为什么呢？鲁迅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深刻地剖析了这些资产阶级革命的代表人物同革命“离合变化”的原因。鲁迅指出：“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这些资产阶级革命的代表人物起来“革命”，不过是一时的“反抗现状”，怀着个人的目的而来，“终极目的”是根本不同的，充其量不过是“有点不平，反抗，改良的意思”。他们的阶级立场，他们的世界观决定了他们不能跟随时代前进，正如鲁迅尖锐地指出的，他们“时”也“趋”过来了，“自己爬上了一点”，成了“干干净净的名人”，也就“随和一些”，不想革命了。革命已使他们“居了要津”，阔气了，再革命，就要革到他们自己头上，对自己不利了，同革命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于是，极力维护旧事物，回复故道，“拉车屁股向后”，走到了革命的反面，转化为复辟的先锋。鲁迅总结的这些历史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鲁迅指出的这种情形，在无产阶级革命中，也同样存在。列宁早在一九〇九年就指出：“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必然有一些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参加无产阶级政党”（《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四二三页）。列宁说的这些“同路人”，就是跑到共产党的内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鲁迅称他们是无产阶级“一时同道的伴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他们的

世界观并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党的最低纲领，却不准备实行，或根本反对党的最高纲领，他们的思想老是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因为那就是他们的“终极目的”。在革命能同他们追求的东西一致的时候，是可以“一同前行”的；然而，在“同走几步”以后，在革命深入发展，同他们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利益、同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相对抗的时候，他们就要同党的路线分道扬镳，“拉车屁股向后”。“把机会主义坚持到底”（同上）。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正是这样一种人。毛主席最近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从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到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的总代表，这就是邓小平走过的路。“走资派还在走。”这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这一点，一不奇怪，二不可怕。它只能使革命人民振奋起来，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破浪向前。

“要催促新的产生”

鲁迅说：“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鲁迅在这里告诉人们：要彻底战胜复辟倒退势力，一面要排击旧物，批判开倒车，一面要为新事物“开辟新路”，催促新的产生。因为，我们的任务是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四一六页）。新的必然代替旧的，革命必然战胜倒退，这是历史发展的必

然规律。如果没有新的产生和发展，那么，人类社会就会“成为死水，纵不干涸，也必腐败的”。当然，“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马克思主义者》第一卷第六〇页）。新生事物难免带有不足之处，它的成长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那些复辟倒退势力总是借此嘲笑新事物，给它加上种种罪名。鲁迅愤怒地回击这些老爷们：“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因为倘不造了戕贼，他就会生长、成熟、老成；独有老衰和腐败，倒是无药可救的事！”

鲁迅坚定地相信，“希望是在于将来的”，革命的新生事物必然会“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他看到现在，坚信将来。他一面努力作战，反对那些贵族老爷在新事物的“嫩苗的地上驰马”；一面“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在旧的残余还没有清除干净的地面上，小心地照顾从碎片底下生长出来的新事物的幼芽”（《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五二六页），使新生事物迅速成长起来。每个革命战士在批判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斗争中，都应该学习鲁迅这种热情关怀和大力扶持革命新生事物的精神。

新生事物是不可能阻挡的，但是，旧势力也决不会轻易灭亡。鲁迅告诫说：“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鲁迅揭露了旧势力使新事物妥协的阴谋，其一就是篡改：给新事物“补充”点什么，其结果“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另一种更阴险，就是在什么“角头”等地方给新生事物“一点可怜的地位”，或者把新事物当作小摆设，“仿佛在客厅里放着许多古董磁器以外，放一

个工人用的粗碗，也很别致”，使新生事物感到“有个小地位”，得到“满足”，“不必再斗争”，这办法是很毒辣的，缺乏阶级斗争经验的人，往往上当。因而，鲁迅一再告诫左翼革命作家：无产阶级文学是为解放本阶级和全人类而斗争的，我们“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

“战斗正未有穷期”。当前，在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和党中央两项英明决议指引下，掀起深入学习，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高潮，形势很好。但是，在这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不甘心失败的阶级敌人还会袭用“老谱”进行垂死挣扎。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随时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把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进行到底！

（原载一九七六年六月四日《解放军报》）

清除革命营垒中的“蛀虫”

——学习鲁迅反对投降派的革命斗争经验

冯 华

革命营垒中的投降派，是革命的最可恶的敌人。它配合公开的敌人，从内部进行破坏，起着公开敌人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对革命危害极大。

早在四十八年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就深刻地指出：“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又说：“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中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鲁迅这些精辟的论述，充分揭示出投降派对革命事业的严重危害。这是鲁迅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从历史和现实的阶级斗争中，总结出来的非常宝贵的经验。今天，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些论述，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不但应该留心迎面的敌人，还必须防备自己一面的三翻四复的暗探”，以便跟投降派展开坚决的斗争，从革命营垒中彻底清除这些“蛀虫”。

鲁迅同投降派斗争，从不妥协，毫不动摇，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始终坚定不移，顶逆风，战恶浪，一往直前，不断揭穿投降派的阴谋诡计，给以猛烈的回击。从背叛新文化革命运动的胡适派，到高挑“国防文学”降幡的“四条汉子”

等形形色色的投降派，鲁迅都曾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胡适这个资产阶级右翼代表，在“五四”革命运动高潮中，混入新文化革命营垒内，从内部进行破坏。他妄图独霸《新青年》，把持领导权，篡改新文化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路线。他的阴谋败露后，便公开向帝国主义、封建买办势力投降，鼓吹“整理国故”、“尊孔读经”，提倡“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这伙投降派凭藉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武力做后盾，疯狂地向革命反扑。在这股凶猛的投降主义逆流冲击下，“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独有鲁迅这株独立支撑的大树，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给投降派以迎头痛击，表现出极其可贵的革命坚定性。鲁迅当时写了《未有天才之前》、《青年必读书》、《导师》、《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一系列杂文，尖锐地批判了投降派的反动本质，指出他们是反动势力的帮凶，是主子的“哈叭狗”、“带头羊”、“媚态的猫”，并提出了著名的“痛打落水狗”的战斗口号。鲁迅这时虽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热情地歌颂十月革命，歌颂使革命取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号召人们去迎接十月革命的“新世纪的曙光”，击退投降主义的逆流。

鲁迅后期，在同形形色色的敌人进行更加激烈、复杂的斗争中，逐渐转变成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斗争中表现出空前的勇敢，无比的坚定。当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时，鲁迅正在广州。他对当时那些钻入革命内部纷纷现出原形的投降派们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怒斥他们“或者投书告密，或者助官捕人”，“用共产青年，共产嫌疑青年的血来洗自己的手”。

鲁迅晚年来到上海。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

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在这严重的民族危机关头，投降派纷纷出笼，活动猖獗。他们从四面八方向鲁迅进行围攻。特别是“四条汉子”，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颇能迷惑一部分群众。他们假借“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号，兜售“国防文学”等投降主义黑货。当时敌人为了迫害鲁迅，挖空心思，施尽各种伎俩，钢刀软刀并用，明枪暗箭齐来。在这场反革命“围剿”中，鲁迅始终英勇不屈，越战越坚强。他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反对投降派的坚定革命立场，不曾有丝毫的动摇。当有些叛徒正“从火线上爬开去”投降敌人之际，鲁迅却公开宣布自己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并以此为光榮。真是暴力压不垮，妖风吹不倒，赤胆红心，铮铮铁骨，充分体现出“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

鲁迅反对投降派，不但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而且目光锐利，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照妖镜和显微镜识破他们的各种伪装。凡是投降派，都是非常阴险狡猾的。他们钻进革命营垒里，歪曲革命口号，篡改革命路线，竭力将革命运动“扭”转到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邪路上去。为此，他们玩弄两面派手法，暗地里结成死党，制造种种政治谣言，来迷惑群众，陷害革命者。三十年代的一伙投降派正是这么干的。他们借口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消阶级斗争，否认无产阶级领导权，竭力迎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需要。他们鼓吹什么无产阶级不要“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他们口头上大讲马克思主义，“表面上粉着‘革命’的面孔”，“抓到一面旗帜”去吓唬别人。对于鲁迅的警告，他们表面接受，表示改悔，但背过身来纠集一批人，在下流无耻的小

报上化名攻击鲁迅。他们嘁嘁嚓嚓，散布谣言，诬蔑鲁迅是“托派”、“汉奸”、“反革命”、“封建余孽”等，妄图用这种“畜类的武器，鬼蜮的手段”，把鲁迅搞臭，即所谓“以谣言杀人”。

然而，鲁迅没有被这种乌烟瘴气的假象所蒙蔽，透过这些变幻不定的形象和五花八门的战法，看清了他们投降主义的实质。鲁迅在这个时期写了大量战斗性很强的杂文和书信，“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识别和战胜投降派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后期的鲁迅掌握了这一武器，因此能清醒地看出，不管投降派变换什么花样，万变不离其宗，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取消阶级斗争，否认无产阶级的领导，在敌人面前“终于是奴才”。鲁迅抓住了这一要害，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使得形形色色的投降派纷纷现出本来面目。鲁迅的战斗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以阶级斗争为纲，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才能识别投降派，进而战胜投降派。

老的投降派被识破、被战胜之后，还会出现新的投降派。只要存在阶级斗争，投降派的“种子就会绵绵不绝”。阶级斗争的规律，决定了反对投降派斗争的长期性。鲁迅从自己亲身的战斗经验中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说：“这样的战斗，是要继续得很久的”，“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因此，鲁迅在斗争中坚韧不拔，锲而不舍，发挥了持久的彻底的革命斗争精神。这种精神，用鲁迅自己的话说，就叫“永远进攻”！一九二七年，鲁迅虽然到广州不久，但凭着他的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特别是他学习和运用了马列主义，敏锐地察觉了革命的危机，及时地向人们敲起了警钟。他在《庆祝沪宁克复